

# 论陈铨的“尚力”文学主张之价值追求

邹 淋

(昆明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摘要:** 抗战时期, 为了凝聚国民反抗意志, 重铸民族精神, 陈铨将德国近现代人本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意志”思想理论的精华运用于文化战线的抗战思想建构中, 提出了“尚力”的文学主张, 倡导激发生命潜质、建构人的主体性。其意义内涵主要包括求真、寓理和主情三个方面, 这既是一种创作观的体现, 也是作为文学思想而存在, 同时更包含着主体对自由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 陈铨; 文学主张; 尚力; 立人; 自由追求; 精神自由;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5639 (2022) 02 - 0113 - 07

**DOI:** 10. 14091/j. cnki. kmxyxb. 2022. 02. 017

## The Pursuit of Values for the Literary Opinions of Advocacy of Vitality by Chen Quan

ZOU Lin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214)

**Abstract:**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hen quan involved the Will mind of modern Germany philosophy system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houghts for the cultural front to unite people's spirit and put forward the literary opinion about the advocacy of vitality. It initiated with inciting life potential and constructing subjective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truth, morality and passion, which showed his creating concept, literary mind, and the pursuit of values for the freedom from subjective.

**Key words:** Chen quan; literary opinion; advocacy of vitality; advocacy of human being; the pursuit of freedom; spirit freedom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提到“战国策”派, 尤其是陈铨的文学创作, 就不能不谈及他们于抗战时期所提出的“尚武”“尚力”的文学理念。它推崇以张扬“力”的方式来改造国民性, 进而去振奋民族精神, 提出反抗侵略的主张, 并期待着以此来促进国家的统一与独立。那么, 什么是“力”? 陈铨为什么要以张扬“力”的方式来立人呢? 其中又体现了什么价值追求? 这些价值追求有何存在的意义? 针对这些问题的提出, 笔者下面就以论述陈铨的“尚力”文学主张价值追求的方式, 来对它们逐一进行详尽的分析与解答。

### 一、陈铨“尚力”文学主张及价值追求的生成

这里所运用的“力”的概念, 主要指涉的是

“生命力”, 特别是人的原始生命力。它源自主体的精神世界, 代表着人对自由的追求, 尼采对此曾做出过生动的描述: “我们所有的意识动机都是表面现象, 背后隐藏着我们本能状态的斗争, 争夺强力的斗争, ……他们的统一性乃是权力意志。”<sup>[1]</sup>由此揭示出, “生命力”是一种心灵与精神性的存在, 包含和表现着人的原始生命本能。在西方学界, 它也被称之为“意志”。其理论源头, 是西方哲学界对万物之缘起的追溯, 并经英国经验派、德国古典哲学与现代人本主义哲学、西方现代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发展而变得日趋完善。陈铨把它的思想特征描述为: “人类本性中最美丽的部分。”<sup>[2]</sup>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在该理论体系的整个发

收稿日期: 2021 - 09 - 13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构建主体与书写自由人生——陈铨‘力’的文学思想对其创作产生的影响论”(2021J0741)。

作者简介: 邹淋 (1980—), 男, 云南昆明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

展中凸显着对“人”的地位和尊严的肯定与张扬。

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面对着近现代以来国家与民族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五四”有识之士纷纷开始行动起来,试图以对西方思想学说的接受与借鉴为工具来改造国民性,期待着以此来启蒙民众,重铸民族精神,激发国民的抵抗意志,并在思想领域掀起一系列救亡图存的意识形态变革。然而,从宏观的层面上来说,他们的文学实践尽管早已将“立人”与张扬生命力树立为创作的精神标杆与实现启蒙的具体手段,就像周作人曾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力是唯一的生命,是从身体里发生的,……力是永久的快乐。”<sup>[3]</sup>但客观而言,这些文化先驱对“自由”的理解,却普遍都存在着认识模糊、态度暧昧、逻辑自相矛盾的弊病。对于这一现象,海外著名“五四”研究学者周策纵先生有着精辟的概括:“除了齐心协力于重估传统与提倡新学之外,他们的具体理念显然并不一致。……当他们把注意力由对传统制度的共同敌视转向寻求积极解答的时候,新式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与日俱增,首先出现在思想上,后来发展到了行动上。”<sup>[4]</sup>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力”对主体构建的意义支持,进而影响到人的完善与发展。

首先,对于“自由”的意义承载对象,学界的理解就是自相矛盾的。对此,在论述中国的“英雄崇拜文化”时,陈铨就曾经敏锐地对如此一种对比鲜明的现象进行过深入的观察与描绘:一方面,“中国军队在 frontline 拼命的精神,服从长官的勇气……其实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sup>[5]</sup>这至少说明在“五四”时期,民众能够自觉地去追求民族自由,并且还还把对民族利益的维护看得高于个人空间的营造。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事情的相反面,并犀利地指出,“五四运动”对个性解放的提倡同时也使个人主义观念肆虐变得“变态发达”<sup>[5]</sup>。于是,对“自由”的追求一方面归属于群体,另一方面也融入了对个人的包含。在陈铨看来,这一指涉对象的模糊不清,将使“尚力”的文学主张之理论建构方式变得缺乏具体性和针对性,因而更容易流于形式与表面。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陈铨才这样特别地进行强调:“我们再也不要任何外在的

规律,来束缚我们自己,我们要根据内在的活动,去打开宇宙人生的新局面。”<sup>[6]</sup>

其次,“五四”运动所选择的实现自由的方式也有些暧昧与含混:既期待着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又觉得在现实中力不从心,从而想被迫改走妥协、改良之路,但始终于心不甘。就像许纪霖所描述的那样:“既要冲破理学的束缚,解放人的感性世界,又要重建人的价值信仰……加上中国知识分固有的‘一元论思想模式’作祟,中国现代文化的分殊化始终不会得到彻底的完成。”<sup>[7]</sup>无疑,这样的模糊性也将降低思想本身改造人生的能力。不仅如此,他们也始终没有清楚地区分出“现实自由”与“精神自由”之间的差别与概念界限,这将会导致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源起自形而上层面的驱动力的缺位,从而不能为人生解惑,进而使支持生命发展的作用变得极为有限,并最终影响到人的发展与完善。正如黄健所言:“这样,‘科学的人生观’就难以解释人的心灵困惑,难以与世俗的精神形态拉开距离,难以获得生命超验意义的支持。”<sup>[8]</sup>这也就是说,他们对自由追求的倡导,既没有明确其意义范围,也不可能去进一步指出该怎样争取自由,在这样的情况下,倡导的行动就只能停留在感性认识与呼喊口号的阶段,而这表现在文学实践中,就局限于作品对矛盾的表面化描写与对情绪的本能性反应的刻画之中;反映到表现的方法上,就包括对反抗精神的宣扬、对复仇意识的强化两方面。至于导致社会矛盾的根源在哪里,如何才能彻底地摆脱人的生存困境,他们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如此去改造国民性,只会使变革换汤不换药,也就不可能完成制度的彻底颠覆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转型,更不能实现人的精神觉醒与升华并由此从根本上提升人的地位与尊严。

有着深厚德国哲学研究功底的陈铨清楚地看到了其中的理论缺陷与不足,于是在此基础上,经过缜密的思考,他决定从对西方“力”的思想的消化吸收与推陈出新入手,以实现文学对现实的介入和干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开始着手以“尚力”的文学主张进行思想创构。其理论精髓,就是要用“力”作为意义支持,来建设人的主体性,使之在主体的四大关系的营造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实现精神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再进一步去更好

地推动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自强。在《尼采的无神论》一文中，陈铨是如此对尼采的思想进行评价的：“尼采认为人生一切推动的力量，不是生存意志，我们对人生能够快乐肯定，就是因为我们有求权力的意志。”<sup>[9]</sup>这就说明了倡导“尚力”的文学主张之目的，是为了实现自由，尤其是精神自由，就像陈铨自己所言的那样：“人类的自我已经发现了，……天才，意志，力量是一切问题的中心。”<sup>[6]</sup>因而从这一角度来看，陈铨的文学实践对“尚力”理念的倡导，同样也体现了“立人”与“追求自由”的思想要旨。

不仅如此，以对这一文学主张的宣扬为核心，陈铨还试图把文学实践当作载体，去强化人的主体性，期待以此来更好地建设人。他曾经这样去阐释“力”的意义内涵：“世界是力量的世界，人类生存的目的，就是怎样去争取力量……，他的努力是需要的，有价值的，有成绩的。人类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sup>[9]</sup>这就是在向世界宣告，对他而言，全面发展人的主要途径，就是在建立人的所有关系的过程中，树立起自身存在的主导性地位。这相当于把自我放在了客观世界的对立面，而他的作品也因此体现出对人的独立自主与精神解放的不懈追求，并于言辞间张扬着斗争精神，散发着寻求变革的激情，凸显着积极上进的人生态度。如在《彷徨中的冷静》中对王建华思想蜕变与升华过程的描写，在《冲突》中对刘女士心理的冲突与斗争入木三分的刻画，在《归鸿》中对楚西的意志追求与世俗观念之间的激烈摩擦和冲突的全景式记录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证。尽管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着激烈的冲突，但故事中的主人公都因为被强烈的理想与强大的意志所支配，因而在阻碍面前表现得义无反顾、一心向前，只为能实现心中的人生梦想。这样的生命的建构，也必然会散发着无限的人格魅力、彰显出“尚力”文学主张应有的理论底色。

同样是追求自由，但相对于“五四”作家而言，陈铨的“尚力”文学主张却有着对自由本质清晰的认识，并给予自由追求以更为丰富的思想意义。其中包含着三方面的价值指向：求真、寓理与主情。当然，一方面，它强调了文学实践必须要尊重文学的规律，要体现出文本存在的具体化、生动

化的特征，要张扬情感，这必然会使其主张拥有创作论层面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其存在意义尤为突出地体现于文学思想的领域：它有着对人生更为深入的探讨，并完善与发展了“五四”文学“立人”的学说。“求真”相当于确认了自由追求的精神性属性，而“寓理”则阐释了主体必须要以反抗的方式来实现自由的道理；“主情”的思想价值在于它在厘清了自由的指涉对象，即作为主体而存在的个人，但同时也指出了主体反抗人生的营造必须要靠张扬激情的方式来完成这一点。于是，在“尚力”的文学主张思想结构中，既包含着对“自由”意义范畴的明确界定，也点明了其承载的对象，同时还具体地阐释了人生存在的应有形式与具体的建构方法。这代表着陈铨对“价值”的求索不在于一般指涉的真、善、美，而是要使这些具体的追求之间产生出密切的意义关联，并能够互相作用，形成一个环环相扣、拥有严密逻辑的、体系化的完整理论，从而使“自由”的存在变得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能够运用具体的方法来支持人生、为生命的发展指出正确的方向。因而陈铨对它的倡导，也就不仅仅停留于简单的情绪宣泄与毫无意义指向的民意煽动的层面，而是能够实实在在地把自由追求变为行动，使之真正可以起到推动人的自我完善的作用。

## 二、求真

关于人的本质，马克思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这样认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衡量对象。”<sup>[10]</sup>这就有力地佐证着：作为“人”，其内在尺度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主体对自由的追求是按照规律来进行的。而规律所涉及的内容范围较为广泛，其中就包括以“真”为内核的规律。“真”所指的是“真实”，求真，就是人对规律的认识和运用。陈铨对此也抱着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再不要外在的规律，来束缚我们自己，我们要根据内在的活动，去打开宇宙人生的新局面。”<sup>[11]</sup><sup>16</sup>很显然，在他眼中，人是根据规律，尤其是内在的需要与尺度来营造人生的。就此来说，渴望与追求自由，就是在“求真”，而欲明晰“真”的本质，就需要主体去全面地认识规律、

尊重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按照规律来追求自由,也才可能更好地实现人的需求,创造人生。

卢梭曾说过:“人生而自由”<sup>[12]</sup>,由此指出了自由是人自身存在的内部规律,这是完全自主的,不受外界的制约与控制,并相当于将自由追求上升到了人的本质的范畴。对此陈铨表示完全赞同,并这样认为:“天才和力量,都是自然,它不受人为规律的束缚。”<sup>[13]</sup>这凸显着他对自由追求的独特理解:它首先是超越功利的,带有纯精神化的性质,并相当于明确了自由追求的意义范畴、阐明了这一范畴设定所包含的内在合规律性。只有这样,主体的人生奋斗才可能表现为一种坚持与守护,并彰显出百折不挠的精神与坚守梦想的情怀,如此正是主体内在强大力量的集中体现。在这样的情况下,陈铨作品对人物的塑造,就都围绕这一理念来进行,由此书写出真人生、坚守真理的人生。为了描绘这样的人生,陈铨笔下的主人公往往都生存于逆境之中,但又有着顽强意志与生命韧性,在行动中,也始终在不懈地追求与守护自由,这完全源自他们内在的生命需要与被激发出的精神力量。其中最经典的创作,就是短篇小说《衣橱》。

在这篇作品里,陈铨自觉地将表现的重点聚焦于对农村妇女婉贞与丈夫刘玉章婚姻关系的描摹之上,试图以此来再现当时民众探索真理、追求人性解放的真实图景,彰显出于现代中国思想启蒙事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国民精神世界建构中所焕发出的新风貌。他们的婚姻是包办的,因而婉贞在丈夫面前显得卑微且渺小,丈夫对待她更是如同对奴隶一般。对此她也有过不满,并想改变它,然而一时却又找不到好的办法,只能选择暂时维持现状。为了寻找到突破口,陈铨刻意设计出如此一个特别的细节: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里,她的弟弟——游击队员郭超突然闯入她家寻求庇护,而刘玉章却要出卖他以换取侵略者给予的升迁机会。对此,婉贞再也不能忍受,挺身而出,哪怕牺牲与丈夫的关系也要去保护郭超。显然,陈铨如此精心地构思出这一情节,是有着深刻用意的:只有一方面设计出外部激发的因素,一方面进行对心理内部原始动因的刻画,才能更好地表现这种决心与行为存在的内在真实性,才可以更加充分地展现出婉贞追求自由的强烈愿望与意识的觉醒,其中所彰显的,就是生命之

真、灵魂之本真。正因为这样,面对危机,她才表现得如此坚决,毫不退却,宁肯斩钉截铁地抛弃那毫无平等与自由的婚姻,也要去铤而走险,由此终于在行动中迈出了实现自我的最关键一步。随后她追随自由的脚步也越迈越轻盈、越发充满力量与信心,人生的书写也变得更加充满光彩:她最终选择大胆地、主动地抛弃丈夫,与郭超一同加入游击队,开始全面地追求理想。这有力地证明了一点:她对自我救赎方式的选择,不光局限于情,也无关是非功利,而纯粹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意志与追求。这源自她对生命本真最根本需求的发现与大胆追求,也是对她敢于拿出勇气去直面现实,以及坚定意志的自我觉醒的最有力表现。

从这里可以见出,陈铨的文学实践有着执着的、对生命本质存在的不懈探索,而这正是他求真创作意识的呈现,其中所彰显的,就是他对自由最坚定的追求。

### 三、寓理

当谈到美的本质时,高尔泰先生曾这样认为:“美是自由的象征”<sup>[14]</sup>。这代表着他真正认识到人对于自由的追求,其目的在于追求“美”,而美的存在是具体的、生动的。对此,陈铨表示高度赞同,并认为:“戏剧家的使命,……与其说是指导人生,倒不如说是表现人生。……解决指导的意思,也在其中了。”<sup>[15]</sup>在陈铨的视野中,作为哲学思想,“力”的内涵是深奥而富有哲理的,但当用它来营造主体时,就必须融入对人生的书写之中,其呈现的方式也就要随之变得感性而具体。于是,本着这样的认识,陈铨进一步把哲学领域的“力”引入到文学理论的设计中,并进行相关的文学实践,力求使其思想精髓的表达能够寓于它所表现的人与事之中,这样具体化的过程,就是寓理。只有这样,他才会如此指出:“文学不但要把握时代,还要了解人性……因势利导,使人类了解宇宙人生真正的意义。”<sup>[16]</sup>这同时还进一步说明,在陈铨看来,在文学思想层面上,“寓理”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它以形象的方式来表现“力”的深奥含义,相当于明确了这一书写必须要介入现实并融入具体的关系营造中的理念。这样进行的文学实践,将有利于“立人”思想的传播,能加速改造

国民性的进程，并使之有了启蒙的思想特性。另一方面，用感性化的方式来表现“尚力”的文学主张——介入现实，必然会涉及具体形象的塑造。这也就是书写精彩的人生等同于为主体的自由追求建构出进取的人生存在形式，为用“力”去解放人、发展人而指明了实现的方向，因而建构的方式必然是对立的、对抗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前者的存在为后者的意义建构提供了认识的基础。作为“尚力”的文学主张——自由追求的一个重要价值指向，“寓理”的意义在于，它不但与“自由”的思想本质相吻合，也同时体现出陈铨为“自由追求”设定“立人”目标的初衷，绝不只停留于“喊喊口号”，而是要重在“切实可行”，就像他曾经所提到过的那样：“文学同人生是分不开的。”<sup>[17]</sup>这与“五四”先驱们大多还停留在对理想憧憬之中的意识状态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其文学实践一开始就在思想定位上与“五四”创作拉开了距离。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陈铨开始自觉地以文学创作为工具，去塑造一系列个性鲜明、有着特定人生经历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都彰显着崇高的理想追求、坚定的主体意志与不屈的奋斗精神，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小说《革命的前一幕》中对大学教授许衡山形象的描写。

许衡山性格直率且刚烈，为人行事讲究理性，坚定果断。他不仅有着渊博的知识，还能随时敏锐地洞察出周围的一切，于是在看问题时，他所表达的观点往往较常人更为深刻与全面，同时又极富正义感与社会责任意识。正因为如此，他一直想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与能力去启蒙民心、开慧民智。在小说中，当看到凌华在面对人生选择时犹豫不决、郁郁寡欢时，许衡山就主动去劝诫与鼓励他：

“凌华，不要这样孩子气，你想想中国现在是什么情形？内有军阀政客的专横，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哪里还有心情谈恋爱？……就应该抛开一切去做救国救民的事业！”<sup>[18]</sup>

很显然，陈铨如此描写是为了表现出许衡山对人生积极而坚决的态度。因为在陈铨的视野中，确立进取的人生观等同于去强化自我意志、去践行主体对自由的追求，这是能使主体摆脱人生困境、走

出人生低谷，实现自我救赎与超越的唯一道路。正因为有了如此坚定的人生信念，许衡山在面对人生困惑之时从不轻易地否定自己的人生观，更不会据此而弃置与逃避人生。

由此可见，陈铨频频将“力”之理寓意于小说创作之中，其用意就在于强调“力”对于生命、人生所发挥的巨大功能，并指出只有真正地把握好“力”，实实在在地把对自由的追求融入现实之中，主体方能始终保持生命的良好状态，营造出进取的人生。也只有这样，“力”对人生的建设也才可能切切实实落到实处，从而真正使人能够不断地战胜各种困难，百折不挠，登上超越自我的生命制高点。

#### 四、主情

情感是文学永恒的表现主题。不仅如此，对文学实践而言，“主情”其实是对人性的彰显，因而也是一种价值追求。这可以从李泽厚先生的明代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中得到证明。在谈到这些抒情作品的艺术特质时，他这样认为：“（明代主情文学）更明显地体现……那种要求自由地表达愿望、抒发情感，描写和肯定日常世俗生活的近代呼声。”<sup>[19]</sup>陈铨也有抱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激烈的感情，不过是健康活力的符号，他要冲破人为的束缚。”<sup>[20]</sup>从这里可以推断，于陈铨视野之中，主情不仅是文学表现“力”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代表了他对自由的追求。同时，也相当于确立了主体融入现实、书写进取人生的具体方法。不仅如此，为了建设“有价值的生命”，情感要去“冲破束缚”与“打破道德”，还代表着它具有个性化的特征，这正好阐明了人的自由追求其实是以张扬个人的尊严与地位为基本出发点的。这样一来，“主情”就并非为情而抒情，而是要让每个人在尽情释放与张扬情感的过程中，实现身与心的双重解放和对自由意义精髓的全面体验、理解与把握。

陈铨的创作也深深地体现出这一特质。他在把情感的凸显当作自由意志来看待的同时，也注重在创作中发挥“主情”的美学功能，使之能更好地融入作品中。其特殊性在于，它所承载的并不是寻常普通的情感，而是激情，其内涵里包孕着浓重的自我表现意愿与意识，渲染着浓墨重彩的人生。为

此,他专门发文进行阐释,“感情是推动人生最伟大的力量,他发源于人类的根本。”<sup>[11]42</sup>就此来看,他的文学创作对“主情”的倡导与实践,的确彰显着鲜明的价值取向,试图去营造个体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以此来凸显自由存在的普遍性价值。而这往往表现于他对剧烈冲突的刻意描摹之中,其中弥漫着浓重的浪漫主义艺术气息,描绘着高潮迭起的情节,宣泄着疾风暴雨一样的情感,显露出酣畅淋漓、一泄而尽的创作气质。

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小说《黄鹤楼》中作家对苏菲形象的刻画。苏菲深爱着王焕章,这不是一般的爱,而是把对爱情的追求视同于对自由的实现。为此,尽管知道王焕章并不爱自己,她也要执着地把自己的内心全部袒露出来,并毫不理会姨妈的质疑乃至嘲笑,终于与王焕章踏入婚姻的殿堂。然而由于侵略者发动的战争夺去了王焕章的生命,得知消息的苏菲无法抑制内心悲伤的情感,于弥留之际,她高喊:

“但是为什么他要死?谁叫他死的?……  
谁叫他死就得负责任!我要替他报仇!我恨极了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你们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要杀他?”<sup>[21]</sup>

尽管爱人的逝去给了她巨大的打击,却并没有击垮她的意志。紧紧抓住这一点对苏菲情感的描写,陈铨不仅连用数个重复的设问,以此增强语言的气势,而且他对情感抒发的刻画,也是顺着:“质问一下结论—表达决心—谴责与控诉”这一线索来进行的。整个过程中,生命体验层层深入,最终触及内心的最敏感处,与之相伴的是越来越强烈的情绪激发,最后达到高潮。由此可见,苏菲对爱情的坚守和对“真”与“善”的追求是一致的,控诉战争的时刻,实际上也是她用主体意志来反抗强权桎梏,并用生命的代价来书写自由人生的时刻。正是这激情的宣泄与彻底的抒发,才生动地描绘出她生命中最光彩照人的瞬间,由此诠释出主体的精神追求与人格魅力,也同时彰显出“力”对完善人生所起到的巨大推动性作用。在这一意义上,生命的逝去并不代表着“力”的消失,恰恰相反,它的存在以另外一种形式的表现而得到了强化,并由推动现实人生发展的力量,变成了超越时空的一种精神存在,极大地升华了主体的精神与

情操。

由此看来,陈铨“尚力”的文学主张之理论建构对“主情”的推崇,正是要在“力”的层面上,通过发挥文学重主观、重自我、重情感的艺术功能,以充满个性化色彩的“情感”袒露的方式,来表现主体的力量,批判一切阻碍人的情感自然抒发的审美理念,扫除一切束缚人性的阻碍,重建人生与精神世界,赋予生命更大的生存空间与更高的存在地位。

## 五、结语

综上所述,陈铨大力倡导“尚力”的文学主张,其中彰显着对自由的价值追求,凝结着陈铨对求得人生真谛与解放人性的强烈渴望,同时也反映出他对张扬人生斗争精神的高度重视,这表现在文学实践之中,就是在创作中对“求真”“寓理”和“主情”的文学理念的推崇与运用。

如此的价值追求表现在理论营造上,就是“尚力”这一理论逻辑环环相扣、拥有完备结构的思想体系的生成:人的主体性建构,首先要认识与尊重规律、树立起按照规律来建设人的理念,这是自由追求的理论根基与合法性之所在,由此明确了自由追求的意义范畴——精神自由。其次,它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将自由追求落实于对进取人生的营造中,实现于对现实的关照里,这就要求人要有生命的韧性并培养出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主体内在生命力的重要展现,同时也是实现主体追求自由、完善自我的重要保障。最后,要实现主体自身的精神完善,就要充分释放与张扬情感,以此来打破社会的桎梏,解放被压抑的人性。

陈铨在“尚力”的文学主张理论架构中,“自由追求”既包含着对“自由”意义范畴的明确界定,也厘清了其自我意义承载的对象,同时还具体地阐释了人生存在的应有形式与具体的建构方法。探究陈铨“尚力”的文学主张的价值追求,就像打开一扇思想小屋的窗户,透过它,可以窥见陈铨对“力”的文学本质的深入洞察与为设计“力”的文学理论架构而进行的全面思考,这是“力”作为意义,真正能承担起为生命解惑、支持人生,由此推动人的解放、实现人的完善与精神自由的关键所在。

## [参考文献]

- [1] 尼采. 权力意志 [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10-13.
- [2] 陈铨. 尼采的政治思想 [G] // 张昌山. 战国策派文存.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306.
- [3] 周作人. 人的文学 [G] // 陈独秀, 李大钊, 瞿秋白, 等. 新青年. 北京: 中国书店, 2011: 469.
- [4] 周纵策. 五四运动史 [M]. 陈永明, 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6: 214.
- [5] 陈铨. 论英雄崇拜 [G] // 张昌山. 战国策派文存.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127.
- [6] 陈铨. 文学批评的新动向 [G] // 张昌山. 战国策派文存.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573.
- [7] 许纪霖. 寻找意义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7: 185-186.
- [8] 黄健. 意义的重构: 中国新文学生成的文化阐释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28.
- [9] 陈铨. 尼采的无神论 [G] // 张昌山. 战国策派文存.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522.
- [10]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刘丕坤,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50-51.
- [11] 陈铨. 文学批评的新动向 [M]. 重庆: 正中书局, 1943.
- [12] 卢梭. 社会契约论 [M]. 陈阳, 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 2.
- [13] 陈铨. 狂飙时代的席勒 [G] // 张昌山. 战国策派文存.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485.
- [14] 高尔泰. 美是自由的象征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2.
- [15] 陈铨. 戏剧与人生 [M]. 上海: 大东书局, 1937: 18-19.
- [16] 陈铨. 欧洲文学的四个阶段 [G] // 张昌山. 战国策派文存.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616.
- [17] 陈铨. 狂飙时代的德国文学 [G] // 张昌山. 战国策派文存.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433.
- [18] 陈铨. 革命的前一幕 [M].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 68.
- [19] 李泽厚. 美的历程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248-249.
- [20] 陈铨. 尼采的道德观念 [G] // 张昌山. 战国策派文存.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 411.
- [21] 陈铨. 黄鹤楼 [M]. 重庆: 商务印书馆, 1944: 82.

~~~~~

(上接第 65 页)

## [参考文献]

- [1] 宋濂. 元史: 卷 38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2] 宋濂. 元史: 卷 13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3] 陶宗仪. 辍耕录: 卷 1 [M] //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7.
- [4] 方龄贵. 《云南王藏经碑》新探 [M] // 方龄贵. 元史丛考.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274-290.
- [5] 张廷玉. 明史: 卷 124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3719.
- [6] 卢汉, 周钟岳. 新纂云南通志: 卷 172 [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9.
- [7] 王亦秋. 元代出镇云南宗王考 [J]. 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0 (2): 5-9.
- [8] 宋濂. 元史: 卷 43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912.
- [9] 宋濂. 元史: 卷 42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889.
- [10] 宋濂. 元史: 卷 117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2911.
- [11] 宋濂. 元史: 卷 29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661-662.
- [12] 宋濂. 元史: 卷 46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961.
- [13] 宋濂. 元史: 卷 141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3389.
- [14] 张廷玉. 明史: 卷 2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20.
- [15] 白健, 殷守刚. 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三事考 [J].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 (1): 68-70.
- [16] 宋濂. 元史: 卷 30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670.
- [17] 倪蜕. 滇云历年传: 卷 5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2: 239.
- [18] 宋濂. 元史: 卷 34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752.
- [19] 韩儒林. 元朝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670.
- [20] 师范. 滇系: 卷 7 [M] // 中国方志丛书: 第 139 号. 光绪三十三年重刊本.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8: 381.